



反省利瑪竇來華的歷史意義

楊意龍著
梁潔芬譯

對一個花了十多年時間去鑽研耶穌會士在華活動的人而言，（註一）理應因近日各界對利瑪竇的濃厚興趣而感到滿足。在這段慶祝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的時期，有關「文化適應」、「東方與西方」以及「中國的宗教情操」等問題，皆重新受到熱烈的討論。在目前全球充斥着衝突及文化抗衡的時代，利瑪竇成爲了一位與今日時代息息相關的人物。他的包涵、忍耐、體諒及接觸中國文化的獨特方式，均足以作解決世界問題的借鏡。的確，利氏在華工作的歷史，對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推行現代化時所面臨的某些特殊挑戰，可以產生照明功用。

然而，我却懷着複雜的心情去衡量及反省利瑪竇在華居留的歷史含義。撇開利氏的貢獻不談，（註二）他遺留下的教訓似乎有多少諷刺性。利氏以科學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以及基督宗教在華傳教史之先鋒人物等身份，爲人所紀念；但利氏自己的動機，却通常未被充份探討。

利氏竭盡全力，以期成爲中國的一份子；他致力於熟習中文，以文言文寫作。（註三）若以今日的標準去衡量，利氏更加是一

位傑出的人物。（註四）

但利氏之所以在華居留將近三十年，目的是向中國的「世界觀」挑戰。他的動機很明顯，就是：一方面要使中國人皈依，另一方面要除去儒家的思想。雖然利氏努力使福音「本位化」，（註五）但當不能妥協的哲學性差異出現時，利氏一定維護基督宗教。在應用「天主」一詞上就是最好的例子。的確，這並非言語的問題，亦非中文詞彙中遺漏了可表達（基督徒所信的）神的詞語。其實，問題很簡單，中國人根本就沒有（基督徒所相信的）神的觀念。我相信利氏本人亦承認這點。

也許利氏過於努力使福音訊息「本位化」，以致於認定中國很古以前已經崇拜基督徒所相信的神，且記載於儒家的古籍裏。自利氏以來，中國的基督徒學者亦慣於循着利氏的路綫，在儒家的典籍中去尋找（他們所相信的）神。不少論文、單張和書籍的出版，也在於說明中文的「天」字是對神的另一種稱謂。這種努力，至今仍延續不斷。（註六）

其實，中國基督徒必須在他們本身的文

化傳統裏找尋天主一事，顯示出一項嚴重的矛盾，而這矛盾正影响着今日國內基督徒的生活。若以較溫和的說法來表達，整個問題就是：我是基督徒抑或是中國人？

再者，有許多人認為，同時保存基督徒和中國人兩種身份是可能的。但我却不以為如此；尤其是這並非僅僅是中國基督徒所面對的問題，而是每一個中國人（不論他是否意識到）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在現代世界裏是否有「中國人」這回事？構成「中國人」的基本要素是什麼？什麼是「中國特性」？「成為中國人」指的又是什麼？

我且舉一個現代香港的例子來說明：一名唱片騎師一次在電台上說：「不像那些洋鬼子，我們中國人每天都煮湯喝。」又說：「我們中國人每天沒有湯，就不能生存。」一名聽眾搖電話告知他在長江以北的中國人，大都不會每天喝湯。事實上，江南一帶的人未必付得起每天喝湯的花費。整件事是要指出那番充滿感情的話背後並沒有理性的成份。這名唱片騎師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但他曾聽人家說，在口頭上承認自己的中國背景是件美德，於是他覺得應該這樣做。

還有一個屬於私人的例子。我有一位好友携着妻兒在一個月前返回香港，目的是想留下女兒給母親代為照顧。在餞別宴上，他大談美國社會如何缺乏人情味及孝道，以及美國教育如何一文不值。他的妹妹回應，問他為何把親生女兒留下。不幸（對他可能是可幸），他察覺不到自己的行動是一種諷刺。

同樣矛盾的事情亦發生在今日中國的領導層身上。我是否把話題拉得太遠呢？不，我實在不以為然。我所指的是中國領導層所發表的談話——認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

有所謂「中國式」的現代化。那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口號，在今天仍然十分有用。中共黨主席胡耀邦在很多場合上呼籲：在引進西方科技時，切勿為腐敗的西方意識型態所影響。（註七）在十九世紀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早已說過，他們要引進西方的技術，却保留儒家的倫理原則。時至二十世紀的今天，中國的領導層也說要引進的是西方的「物質」，而不是西方的「觀念」。但事實却是：當中國人尚未成功地引進西方的科技及方法之前，早已引進了西方的意識型態——馬列主義。

在基督徒方面，從一些中國基督徒的著作中亦可看見這種態度的流露。單從最近由香港出版、討論一九九七問題的基督徒雜誌上，便可見一斑。（註八）香港基督徒表示，在一九九七年後，他們會繼續留下，因為他們也是中國人。我不知道這種信念流行到什麼程度，或說這番話的人實踐了多少承諾；然而，當感到有需要這樣發表時，這種需要本身已經是一項矛盾。為何需要作這樣的肯定？又為何不乾脆地說：因為是基督徒，所以要留下？

看到耶穌會士那份令人欽佩的努力背面的最後「敗績」時（若以皈依者的數字來衡量），我不禁這樣想：假若傳教士當初致力於強調東西之差別，從而希望在思想上形成更大的影響，也許基督宗教在華的傳教史會另有一番景象。若只是努力尋求東西方可以互相妥協之處，最後只會釀成一種「不倫不類」的中國思想。或許，中國基督徒要認清楚：他們必需首先是基督徒，然後才是中國人；他們必需選擇，因為在兩者當中沒有中間路綫可走。

的確，如果中國人必需走向現代化，那

麼，就全力以赴好了，讓本地文化自然而然地去影响現代化的過程吧。目前中國最大的困難是：一方面要努力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掛慮這種是否「中國式」的現代化，結果，對任何外國的事物往往造成一種非理性的態度。若瑟李文生（JOSEPH LEVENSON）在論及中國現代思潮時，指出（中國人）「對中國的傳統既在感情上留戀、又在理智上割離」，看來確有其道理。（註九）

本文主要是想從利瑪竇來華的歷史含義中去找一些更大的問題來討論。從個人方面來看，可能有人會同時實踐了基督徒及中國人兩種身份，但這往往是例外。在本文裏，我是從中國近三百年來與西方接觸的過程中，去回顧利瑪竇在華傳教的歷史，而重點特別放在中國致力於現代化一事上。

倘若目前的中國領導層在推行現代化時，不正面去解決問題的話，所謂的「傳統」及「封建」兩座大山，仍然會不斷地困擾着中國人的整體思想。如果如此，則中國現代化又會像鐘擺一樣，一方面既不能不向外求援，另一方面又拒絕在這方面得到的成果。

附註

（一）我主要是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去做研究，并運用一些到目前仍為人所忽略的中國資料。本人今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書，名為「儒家思想與基督宗教——第一次接觸」。下一個計劃是研究「第二次接觸」，即是研究第十九世紀的中西交流。

（二）「鼎」十二期之利瑪竇專刊上充份說明了此點；也許利瑪竇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影响，應加以詳盡分析。

（三）對利瑪竇學習中文方面應詳加研究；雖然可能有中國教友的協助，但無可否認，利氏在中文書寫方面，仍勝於所有當日居華的傳教士。

（四）由於我一向從事中國研究，本欲在這點上多所發揮，但又恐會開罪某些人士。此外，我又認為，很多人已知悉這點，他們在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時，會慎加挑選。

（五）參閱「鼎」十二期《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教宗在紀念會上發表的演詞》。其中「本地化」一詞似乎富有革新性，但細思之下，我認為這是「文化適應」的另一種說法罷了。

（六）我曾在「鼎」讀到一些討論這方面的文章。

（七）參閱南華早報（八三年一月三日），其中轉載胡耀邦在八三年一月二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演說。

（八）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發表了很多關於此項問題的文章。

（九）JOSEPH LEVENSON :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